

## 在战略相持阶段抓住中美战术缓冲期

胡 华\*

在世界百年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世界各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在疫情的冲击下都成为可能。例如,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由于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触发了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矛盾,特朗普在大选中败给拜登。拜登入主白宫11个月,时间虽然不长,但中美关系的变化却是跌宕起伏。从2021年3月的阿拉斯加会议到11月16日的习拜视频峰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岁末有必要回顾一下中美关系。

### 一、中美要相互尊重,不能战略误判

如果从2018年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摩擦起算,一直到2021年11月16日习拜视频会晤,中美关系在这五年里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紧张对立到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微调,出现战术缓和期。造成中美关系发展迂回曲折的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在涉华战略上采取了三个根本性的误判。一是将中国误判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二是误判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为了取代美国和改变全球治理的规则;三是高估了自身的能力,认为凭借自身优势,能在短时期内打垮中国,迫使中国认输服软,低估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因此,美国一开始就采取了错误的做法,从贸易战延伸到科技战、意识形态和人权领域,甚至不断挑触“一个中国”的底线,以致在美国国内形成“全政府和全社会”对中国打压的政治氛围。

由于在根本问题上判断失误,不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没有达到

---

\* 胡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打垮中国的目的。相反,中国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作了科学的分析,审时度势,冷静处理,在逆势中实现突围,取得一系列胜利。在经贸领域,中美贸易持续增长;在高科技领域,美国的所作所为成为催发中国科技独立自强和自力更生的驱动力,关键领域突破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在外交领域,中国在安克雷奇会晤中反击了美国的霸凌主义,在天津会晤中对美国划出了“三道红线”和“两份清单”,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通话向美方明确了中美关系的必答题,迫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美国寻求与中国共存,而不是遏制与新冷战。

所以,习近平主席在11月16日视频会晤中对拜登说:“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希望总统先生发挥政治领导力,推动美国的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拜登也表示,美方愿同中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加强沟通和减少误解,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使两国人民都能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 二、中美关系是复杂的,不是用“竞争”就能概括的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类似人体上的神经系统,需要谨慎处理和对待。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复杂性之一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深度交织,涉及面广,不可能脱钩。特朗普和拜登都采取了一系列脱钩措施,但一直没能完全脱钩。所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近期提出中美要“再挂钩”。

复杂性之二是战略和政策是由人来制定的。美国政府官员来源于各个利益集团,这导致美国政府部门在涉华问题上出现多种声音:以国务卿布林肯为代表的价值观派主张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开展持续的斗争;以国防部为代表的地缘政治派片面夸大南海对美国的重要性,渲染南海的危险性,在南海对中国搞军事威慑;以财政部、商务部和贸易代表为首的经济派主张更多地从经济角度考虑中

美关系；以克里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派主张中美两国在全球反恐、新冠疫情和气候治理等领域进行合作；沙利文则主张中美“共存”。

前两派对华态度以强硬为主，手握人权牌、价值观牌、军事牌以及地缘政治牌，甚至在国际上打“台湾牌”，妄图冲击“一个中国”的底线；后三派较为理性，更倾向于务实，主张中美合作。所以，我们不难理解美国为什么在涉华问题上会出现相互不协调的杂音。

复杂性之三是拜登在不同场合的涉华态度不一，甚至前后矛盾。这不只是因其本身对华战略尚未成型，还因其对华战略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社会和舆论环境的制约，使其涉华真实意图难以揣摩。

复杂性之四是受到美国政体的影响。美国是个选举国家，确立的又是三权分立的制度，因此，政府领导人的涉华政策和言论还受到国会和选民的制约。

复杂性之五是在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情况下，中美关系还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在世界抗疫斗争中，中国和美国实施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抗疫方案。抗疫演变成政治问题，催发了美国国内潜在的矛盾，这反过来又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立场。新冠疫情的变化是否会使拜登步特朗普的后尘很难说，但至少疫情防控不力已成为影响拜登民调的重要因素。

复杂性之六是中美关系受到英法德日俄等第三国（或称“中间地带”）的影响。第三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但这些大国增加了中美运筹两国关系的成本和考量。

### 三、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美国国家战略的制定是有周期性的，一项战略的出台需要一定时期的酝酿。从中美关系的相互交往及中美关系在上述复杂因素制约中的运行分析，现在战略界一般都认为，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已悄然发生了变化了。如果把中美的竞争关系视作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14年到2018年特朗普启动贸易摩擦为第一阶段，即酝酿阶段。

第二阶段,从2018年到2020年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在这个阶段,美国处于战略进攻,许多摩擦都由美国主动挑起,中国是被动应战。特朗普从经贸摩擦入手,延伸到科技、人文交流、意识形态和安全领域,在美国国内形成一股“全政府全社会”对中国进行打压的舆论态势和政策导向,企图在短时间内逼迫中国投降就范。但中国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沉着应战,成功地挡住了特朗普政府的攻击势头,将美国拖入了与中国对峙的相持阶段,反过来逼迫美国坐下来与中国谈判,签订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第三阶段,从2021年1月到现在,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美双方在制度和道路上都持有坚定的信念,双方不会退让;第二,中美双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难以在短时期内取得压制性的胜利;第三,双方都有管控对抗和冲突的需要,避免与对方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第四,“灰色地带”斗争将成为常态化;第五,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做出部分微调,减缓了中美关系的下滑速度,对中国而言出现了“战术缓冲期”。

#### 四、战术缓冲期需要关注的几个情况

第一,中美竞争的主动权逐渐发生变化,中国由被动应付逐渐转为主动,在局部领域,已由最初的焦虑变为淡定。习拜两次通话和11月16日的视频会都是美国主动提出的就足以说明问题。

第二,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企图在国际上组织反华战略同盟的计划在实施中受挫。不少美国盟友都不愿在中美关系中“选边站”。

第三,中美两国解决各自国内问题的能力已显示出明显的差距。如何有效解决各自国家所存在的问题是中美两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已经找到了解决国内问题的道路和方法,如脱贫和共同富裕,教育领域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而拜登虽然看到了问题的存在,但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两者相比,差距就很明显了。

第四,中美两国制度的并存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

的认可。通过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是抗击新冠疫情的实践,在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已迈过低谷,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站稳了脚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包括在美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传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是“一枝独秀”。

上述四个情况的出现,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中美关系时必须要考虑和关注的。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决定了美国对华的基本战略是不会改变的,但拜登政府目前所面临的压力,尤其是中期选举压力,迫使其下一步在对华政策上会在一些具体政策或者是战术上做出一些微调。经贸问题、人文交流、气候合作、朝核、伊核和阿富汗等问题可能成为中美互动的主线。但不排除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高科技领域、安全领域、全球治理领域以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对中国实施打压。因此,中国一定要充分利用好目前出现的战术缓冲期,有理有节地做好对美工作。

## 五、中国应扩大自身在战略相持阶段的主动权

第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相持阶段中美关系的现状,继续端正心态,冷静处理,克服“恐美”和麻痹轻敌的“速胜论”,避免战略误判。要清醒地看到,目前美国出现一些转暖的动作,仅是战术上的调整,其对华基本战略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第二,力争在美国的薄弱环节中实现突围,进一步扩大中国的主动权。在战略相持阶段,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美国也在与我们抢时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近期称,现在美国必须思考和关注的是建立“实力情境”。拜登政府现在最主要的举措,就是努力补充美国国内的力量储备。美国对华进行战术调整是无奈之举,其目的在于争取时间进行政策调整,核心是尽快加强自身的综合实力,与盟友和伙伴形成合力对中国进行压制。在未来10~15年期间,中国对美国仍然是“以弱克强”。中国不能对美全面反击,而要寻找美国的薄弱环节,从中突围。当前,这种机遇还是存在的。首先,抓住美国国内对华虽有“竞争、合作和对抗”的共识,但在如何竞争和对抗上还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抓紧做好在美

国本土的交友和宣传工作,通过各个渠道和阶层阐释我们和平崛起和双方共存的理念,为美国政府的务实派搭建转圜的平台。其次,抓住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反对全球化的机遇,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全面落实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快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落地以及我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相关谈判,寻求中欧关系转圜并推进《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确保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再次,抓住美国盟友对美国的国际信誉存疑的机遇,进一步做好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在非洲、欧洲和亚洲等地区巩固老朋友,发展新朋友。最后,利用我国市场优势、资本力量和不断发展的高新技术,加大与欧洲、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等先进国家的科技合作,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完善和制订全球科技治理的新规则,突破美国对中国的围剿,增加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成本。

第三,重心在国内,做好国内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稳定工作,为打好与美国的“消耗战”提供后劲。战略相持拼的是持久力,打的是“消耗战”。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要加快培养和引进人才,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完善产业体系,夯实物质基础;对关键技术进行攻坚,加快推进军民融合,提升我国的国防军事能力;确保我国国内的社会稳定,形成对美工作的韧劲。

第四,加强地方交流和民间交流工作,做好人的工作,扩大朋友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现在在美国,我们不是朋友多了,而是远远不够。我们可以利用美国联邦制的特点,“跳出华盛顿”,在美国地方上开展工作,要利用美国各州与中国合作的意愿,深化与美国地方州的交流。发挥中国地方政府的优势,恢复和强化中美地方省州长论坛,有计划地向美国地方提供适度支持。要开展争取民心的工作,在对对华极端鹰派分子实行精准打击的同时,结交新朋友,力争推动中间力量向中国转化。明年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又恰逢北京举行冬奥会,中国可以进一步通过开展体育外交来营造中美和谐的气氛,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